

外国人丛书

[澳大利亚] 唐纳德·霍恩 著

澳大利亚人

——幸运之邦的国民

THE LUCKY
COUNTRY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外国人丛书 · 外国人丛书

[澳大利亚] 唐纳德·霍恩著

澳大利亚人

——幸运之邦的国民

徐维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Donald Horne

THE LUCKY COUNTRY

Penguin Books, fifth edition, 1998

Copyright © Donald Horn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NGUIN AUSTRALI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 - 1999 - 094 号

澳大利亚人

—— 幸运之邦的国民

〔澳大利亚〕唐纳德·霍恩 著

徐维源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84,000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2345-3/D · 057

定价：12.80元

译者的话

去 澳大利亚之前,不止一次听说过澳大利亚如何富足,如何美好,似乎澳大利亚是一个世外桃源。80年代译者留学澳大利亚,后又执教于那里的高等学府,感到澳大利亚确实是一个幸运之邦。澳大利亚资源丰富,社会稳定,普通老百姓“一般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房子、汽车、牡蛎、芦笋罐头、龙虾、海滨休假、高尔夫、网球、冲浪、钓鱼以及花园”;他们崇尚平等、信奉“唯物主义”、珍惜伙伴情谊。当然那里同样也有悬殊的贫富差距,但是一般穷人的生活也过得不差。

不可否认,澳大利亚的富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得天独厚的辽阔疆域和矿产资源;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澳大利亚人通过辛勤开拓和努力发展,在短短的近200年的时间里,把一片处于石器时代的大陆变成了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作为地球村的成员,我们需要深入了解我们的邻居,包括澳大利亚这样的远邻,光知道悉尼歌剧院、皇家十字区、树熊和袋鼠是远远不够的。本书是对澳大利亚人的生态环境、心理习惯、社会结构以及他们在60年代面临的内外挑战的勾勒。在最近由悉尼的《悉尼信使晨报》和墨尔本的《时代报》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本书被70%的普通读者以及一批特邀的专家学者评为

澳大利亚在 20 世纪里影响最大的一部非小说类著作。霍恩当时写得很匆忙,线条很粗,有时甚至显得有点草率,但他生动地刻画出了澳大利亚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精髓和本质。此外,因为本书是写给他的同胞们看的,旨在警世,所以语多讥讽,毫无掩饰浮夸。本书初版至今已 30 多年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大利亚也已经旧貌变新颜。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人还是在做着同样的梦,他们的怀疑主义、享乐主义、乐观主义和实用主义还是一如既往。他们面临的差不多还是同样的一些问题:如何确保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浪潮中不至于落后得太多,如何达到高度的社会和谐,如何调整自己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选择共和国还是保持君主制,沾沾自喜于幸运之邦的成就还是设法变成聪明之邦、创造之邦,等等。《澳大利亚人》不是一本沉闷的学术著作,但认真的读者自能体会到其价值,同时注意到作者不时流露出来的政治偏见。

为帮助阅读理解,译者增添了一些脚注,而书中未加标明的脚注则为作者原注。

1999 年 7 月

于澳大利亚堪培拉

第五版导论

当我在 1963—1964 年的夏天写《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时，谁能想象得到它在 30 多年以后会成为一部“经典作品”？当时的那些自封的权威认为肯定是不可能的。一位评论家说它的寿命不会长过一个季节。在它出版的时候，确实没有人（我也绝对没有）预见到它立竿见影的空前的成功。然而，现在回顾起来，它成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本书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表达了以不同方式郁积于成千上万澳大利亚人心里却极少有人谈论、至少没有一股脑儿畅所欲言的许多想法。它写在孟席斯统治的末期，那时澳大利亚似乎正遇到麻烦。世界上到处是变革和挑战，而澳大利亚却死水一潭。《澳大利亚人》触及到了几乎所有的那些变革和挑战，并通过这种触及促进了某些变化。不过，为什么现在人们要阅读它，或者重读它呢？

重温“经典作品”总是令人好奇的，它本身就是件很有意思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三个直接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看看《澳大利亚人》里写的东西有多少在今天还和当时一样符合实际，它对当时澳大利亚的一些描写在多大程度上在今天依然准确无误。对于这种比较，许多年轻人可能比我更在行。例如：“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体育就是生活，而其他都虚无缥缈”；或者，

“澳大利亚人不想受语言的蛊惑。……他们听到华丽词句就像狗嗅到诱饵而满怀狐疑”；或者，“这种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是种真正的生活哲学。……澳大利亚人以捞取实惠为乐”；或者，“一旦被迫行动，澳大利亚人会高高兴兴地‘试一试’”；或者，“当你看到站在吧台周围的男人那么急切那么强烈地想显示他们的男子汉气概时，你几乎觉得他们简直会扯开裤子的拉链”。假如这是一份考卷，我会问：在今天考虑澳大利亚的时候，这些论述还有用吗？请详细说明。

重温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系列有关当时的社会现象的颇有用的写照，包括提醒人们我创造“幸运之邦”这个词时的真正本意，即要人们注意澳大利亚的某些方面。但这一切不是为了怀旧。

不错，这本书是以“天真的欢乐”为题开始的。我还写到了“人生的意义体现在周末和假期”、“澳大利亚人普遍认为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对待是政府的工作”和“很少对成功作大肆宣扬”等等。所有这些意味着那是写在 70 年代初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战后长期繁荣结束以前的一个较有信心、对一切较有把握的时期。在那些年代里，所有发达的工业国家都同时经历了奇迹般的高经济增长和高就业。在澳大利亚，“工作机会和经济增长”好像是一个完美的制度的一部分。回想起来，对一些澳大利亚人来说，那也是由白色尖桩栅栏保护着的高枕无忧的时期。人们之所以能高枕无忧，是因为在那时人们可以期望找到能干上一辈子的活。

接着“天真的欢乐”的那节就是“没有头脑的国家”。除了提供一份可能是最简洁的关于在孟席斯年代失去的机会的记录之外，《澳大利亚人》还对澳大利亚的精英——尤其是企业家、政治家和工会领袖——进行了从非左翼立场出发的最为严厉的书面

抨击。这一抨击在我创造“幸运之邦”这个词的那段文字里达到了极点：“澳大利亚是一个主要由二流水平的人治理的幸运之邦，这些人沾了国家的好运的光。澳大利亚的生存依赖于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尽管它的普通老百姓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它在所有领域里的大多数领袖对周围世界发生的一切都太缺乏好奇心了，以至于经常会措手不及。”

从本书能够学到的另一点是，曾经被说成是“激进”的做法现在看来可能显得相当温和、甚至保守了。在那些日子里，用两节文字写“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是很“激进”的，可是如果现在读这两节，就会觉得它们写得很拘谨。我在书里揭露了当时依然在全面执行的白澳移民政策，指出其出发点是种族歧视，而不是出于对社会协调的合理要求。但我提出的改变这个政策所应采取的步骤，即与一些亚洲国家签订“在语言、教育和工作能力方面具有公开明确的同化标准”的移民限额协议，是保守的、试验性的。（不过，我的不管以什么方式发生的种族变化，都将决定“澳大利亚的命运”的说法，也许是激进的。）事后回想起来，我提出的对土著居民在历史上受到的虐待作出补偿的措施也许现在在很多人眼里是反动的。书里在说到驱逐土著的“野蛮”历史应该“使现在的澳大利亚人感到惭愧”时，是激进的。令人遗憾并出人意外的是，直到今天，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感到惭愧仍会被人视为过激。根据当时的进步的标准，我提出的唯一的补偿方法是通过“同化”，使土著居民能“采取与其他澳大利亚人同样的生活方式，作为单一的澳大利亚社会的成员而生活”。我没有提出让土著保持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他们希望那样的话。这个想法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实际可能性而进入大众文化。

“同化”这个词在本书中有关非英国白人移民的那一节里也

用得很多。不过,只有在说到普通澳大利亚人自己向欧洲人同化和“最好的同化是在床上实现的”时,我才是取的它的褒义,这是我自己的有点独特的用法。我没有提到“多种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少数民族”(ethnic)这个词那时也还没有移植到澳大利亚。看《澳大利亚人》里缺了什么是判断它的历史意义的一种方法,这两个词就是例子。(对某些人来说,正是这种缺乏或许会让他们留恋地回想起这些新词出现以前的悠闲日子!)在当时那种思想普遍枯竭的气氛下,我没有专门提到经济阶层。“公平分享”的概念在那时还真有点意义,经济上的不平等在那时远不如现在这样严重,人们那时对待经济不平等的态度虽然一方面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则是满不在乎。记住这一点是很有启发的。书中有一节是关于贫困的,但因为那时对贫困的研究还没有得到更新,我的讨论现在可能看起来有点敷衍了事。“妇女”也占有一节(用“妇女”作为独立的标题是非同寻常的),虽然其中确实指出了在澳大利亚,无论是寻求事业机会还是休闲娱乐,基本上仍然是男人的事(如“当男人们站在酒吧里,憧憬着他们想与之睡觉的女人的时候,他们的老婆们在家里聚在一起喝下午茶,幻想着新的床罩”),但书里对两性问题的整个处理是粗浅的,所用的语言和形象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中性的。比如,当我想说明澳大利亚的男人可能比他们乐意显示出来的更恋家时,我说:“澳大利亚的形象是一个穿敞领衬衫的男子一本正经地品尝着冰淇淋,旁边站着他的孩子。”因为在当时描写澳大利亚人时通常是把他们描写成男人的。要过了10年,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书籍出现以后,这一段才被正确地(尽管是回顾性地)重新理解为性别歧视的表现。

《澳大利亚人》的价值在于它既是持久不变的真理的源泉,又是对过去的发人深省的简述。不过,今天重温它还有第三个更重

要的理由,那就是,在 90 年代,我们又一次进入了忧虑和不满的时期,要是我们恰当地运用这本书,它能为这些问题提供启示。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想指出一些令人高兴、非常重要的社会变化,不过这种高兴是有所保留的。(事情开始走上正轨之际,也是聪明人得担心它们或许会出岔子之时。)这些变化是,从 60 年代初到 90 年代这段时期里,澳大利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成了一个公开地提倡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实际上也成了个自由得多的社会。对这点只要想想我在《澳大利亚人》里提供的它的褊狭和反自由主义的证据就清楚了(我原来提到了一些,下面是全面的概括)。

- 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种族兼宗派仇恨,加上各自的阴谋集团和秘密组织,长期分裂了这个国家,而这种分裂前不久才停止。
- 那时土著居民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从来没有人问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土著被看成是一个滋扰白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土著不再作为土著。
- 以肤色为基础的白澳移民政策几乎渗透了澳大利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澳大利亚人》写作之际,在工党的政纲上,保持澳大利亚作为白种人国家的政策依然列为该党的靠近头条的政策。再早 3 年,在接手担任《公报》杂志编辑时,我在一片反对声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该杂志的口号“澳大利亚是白人的”。
- 出于同样的种族优越观的缘故,我在《澳大利亚人》里提出的澳大利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殖民地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独立国家的预言被人认为是“过激”的。
- 当时依然存在着迫使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迅速“变成澳

大利亚人”的目光短浅而又不容怀疑的政策。在上层人士心目中,澳大利亚在世人面前最大的骄傲在于它是属英国的。在重大场合,英国国旗飘扬在澳大利亚国旗的边上,似乎那样能增加后者的分量。我们以高唱“上帝保佑女王”来强调自己祖国的重要性。我们的总理孟席斯想要把澳大利亚新的货币单位称为“royal”^①而不是“dollar”(元)。

- 在很大程度上,清教徒禁欲主义者是那时社会、文化以及私人生活标准的制定者。几百部书籍和电影被禁止;6点以后在酒吧喝酒和在餐馆卖酒刚刚才合法;流产和同性性行为是犯罪;离婚受到限制;星期天的体育比赛和竞技场外的设赌是非法的;除了主要为男人服务的酒吧,郊区没几个普通老百姓可以聚会的地方(所以我在《澳大利亚人》的一开始就写了悉尼一个新的老虎机俱乐部里兴高采烈的场面。这些俱乐部为城郊的社交生活提供了最早的突破);“性解放”、反越战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和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那时还没有到来。

所有这些能为目前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大多数时候,澳大利亚朝向宽容和自由化的变化多半是和平发生的。这证实了我在《澳大利亚人》里表达的信心,即“澳大利亚普通老百姓看上去有适应能力”,特别是考虑到澳大利亚人开始经受到的那么巨大的震撼:如劳工市场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保护主义者”对“国家发展”这一坚定信仰的挑战,以

^① 英语 royal 意指“皇家”。澳大利亚在 1966 年将英式币制改为美式币制。——译者

及任何残剩的对“荒野”是澳大利亚一切繁荣和优越性的宝库的信念的破灭。(《澳大利亚人》里阐述的“根本”事实之一,是澳大利亚总的来说是个“城郊国家”。)问题是,尽管澳大利亚人曾经表现出实用主义的适应能力,90年代中期在公众生活中突然冒出的全然不讲实际的反对宽容的逆流,特别是种族主义的卷土重来,令人惊恐。

澳大利亚人的两个特点可以说明这一现象。

第一个特点是,澳大利亚人接触宽容还为时不久,他们还没有多少在大庭广众谈论宽容的经验。而在这段迅速变迁的时期,也许太多的具有进步倾向的澳大利亚人说得太多了。《澳大利亚人》再三警告要注意澳大利亚人顽固不化的实用主义和怀疑主义。要是进步人士使用多一些实用主义的语言,可能会更合适一些。他们期待太多的宽容,是不是因此而引起了别人的反感?在宽容方面,澳大利亚的进步分子应该学习的第一课也许是要认识到,宽容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爱每一个人,它只是意味着我们愿意与我们不喜欢、但相信是跟我们同样的公民的人共处,仅此而已。(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实用主义、更充满怀疑精神呢?)在进步分子说得太多的同时,太多的保守人士变得太沉默寡言。如果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请读《澳大利亚人》中“没有头脑的国家”那一节。那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老和年轻的保守派对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那种似乎一切都确定无疑的状态的留恋不仅仅是心地狭窄,这种留恋也显示出他们对那些日子的实际情况的懵然无知。当时的那种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种强加于社会的表面上的一致性;而我们现在再也不向社会强加这种一致性了。保守分子在宽容方面需要学习的第一课是,维持社会协调并不意味着把早在《澳大利亚人》写作之际已经支离破碎的一致性强加于社会;宽容意味着承认

差异,不设法压制差异,以及寻找使全体人民不管有什么差异仍然能够共同生活的途径。

不够宽容该责怪谁?责怪有偏见的澳大利亚人民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会接触到澳大利亚人的第二个发人深省的特点。

《澳大利亚人》里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也是认识澳大利亚的过去和将来的关键,是我们在又一次想从“人民”那里找出澳大利亚的毛病的根子以前,应该十分小心。我们在这方面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甚至创造了一个词组“高颞颥综合症”^①,以暗示是普通百姓的妒忌阻止了英明的领袖人物的出现,而事实上真正阻止英明领袖人物出现的是领袖们自己的平庸。正如我那时所说的:“这种习惯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虽然普通澳大利亚人具有许多优良的、有些是相当突出的特点,但现在的那些精英基本上是二流水平的”。(澳大利亚的许多精英如今不再是二流的了,但我们中间还是没有涌现出多少有才华的政治领袖。)任何社会里都有害怕外国人的人、种族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满怀怨恨的人。绝对没有证据证明在有偏见的民族的名单中,普通澳大利亚人名列前茅(只要看看在欧洲发生的种族净化或法国的勒·彭^②领导的“国家阵线”就知道了)。在90年代中期发生的,特别是在玛波案^③之后发生的,是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们变得手足无措。最高法院根据其对普通法的解释,就玛波案作出了

① 相当于中文里“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的意思。——译者

② 勒·彭(1928—),法国政治家,其创建和领导的极右的国家阵线大力鼓吹驱逐在法国的移民。——译者

③ 玛波(1936—1992)在1982年和其他几个默里岛岛民一起,提起诉讼,指控昆士兰政府对他们部落世代居住的土地自殖民地时代以来的占有是非法的。最高法院就玛波案的裁决在全国各地引起了众多类似的诉讼。——译者

若干判决,其中之一是,在英国人最初抵达澳大利亚之际,土著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如果那些支持最高法院裁决的人更谨慎精明一点的话,他们应该使用更冷静的语言,像凡夫俗子那样谈论普通法和产权,而不是高谈阔论重大原则,或者不光是高谈阔论重大原则。在另一方面,人们希望那些反对最高法院裁决的人声嘶力竭地发出的是澳大利亚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最后声音(最高法院拒绝接受白人至高无上的黄金时代的神话,使这些人大吃一惊)。在波林·汉森^①的问题上,所有的政治精英都知道该如何反应,只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即作为总理的约翰·霍华德^②。要是他仔细读过《澳大利亚人》,也许就不会存有那个幻想,即 90 年代的政府还可以拿他自己青春时代那 10 年里的那种强加于社会的必然性当回事了。

“幸运之邦”这个词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误用,似乎它是对澳大利亚的颂扬而不是一个警告。这种误用是社会上各种各样头脑空虚、只会夸夸其谈的人的胜利。在本书刚出版时,谁都不怀疑这个词的讽刺意义。但是,这些年来使它变得与其本意正好相反的歪曲,使书里大声疾呼的对澳大利亚的未来的三大警告再也听不到了。我的警告是:必须接受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挑战;在确定经济发展优先次序方面需要有革命性的变化;以及大胆地重新评估国家的现状的必要性。这三个警告现在可

① 波林·汉森(1954—),1996—1998 年任联邦议会众议员,1997 年创建单族党并担任领袖,主张限制亚洲移民,反对多民族文化主义,对土著居民成见极深。——译者

② 霍华德(1939—),1985—1989 年及 1995 年以来任自由党领袖,1996 年以来任总理。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拒绝公开批评波林·汉森反亚裔、反土著的种族主义立场。——译者

以照样重提,不过需要用更大的声音了。

很多澳大利亚人已经满足了第一个要求。与一些“亚洲”国家的更多的交往已经帮助澳大利亚进入了其历史的第二章。无论是作为游客、专业人士、专门机构的成员、行政官员、艺术家、教育工作者,或者有时候作为实业界领袖,他们都在用《澳大利亚人》里所建议的那种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和澳大利亚。

但是那种把亚洲看成几乎仅仅是一架我们能从中赚到几块钱的经济机器的浅薄的实用主义,使本来富有创造性的觉醒黯然失色。在《澳大利亚人》里,我告诉心地慷慨的人们,不要把他們看到的不结盟的“亚洲”领袖们道德上的优势理想化。现在,我要告诉头脑精明的人们,不要把亚洲虎^①在经济上的飞跃理想化。光比较国内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一切。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的社会比任何亚洲虎社会都更公平、自由、民主、宽容(对那些其政府虚构出可以随心所欲地套用的“亚洲价值观”为专制统治辩护的国家来说,尤其是这样)。根本的问题是“亚洲”这个词变得太大,含义太空。在《澳大利亚人》里有个警告,即不要以为存在着一个叫做“亚洲”的巨大的整体,因为在事实上只存在一个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国家的组合。这个警告今天看来不如我当时提出来时那样有效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90年代的一位总理^②表现得好像是他一个人澳大利亚人发现了“亚洲”(顺便提一下,他的“亚洲”似乎不包括印度次大陆);而在他以后的一位总理^③则可以在雅加达的一次国

① 指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省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译者

② 指保罗·基廷(1944—),1983—1991年任财政部长,1991—1996年任工党领袖,1991—1996年任总理。他大力鼓吹亚洲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意义。——译者

③ 即约翰·霍华德。——译者

宴上宣布“澳大利亚不是亚洲的一部分”。这种政治上的愚蠢不仅使澳大利亚人感到困惑,甚至会在他们中间造成分裂;它还会重新唤起我在《澳大利亚人》里嘲笑过的那种对“没有个性无以辨别的庞大人群”的恐惧。如果你以为亚洲人全都一个样,你就会想象有个叫做“亚洲人”的单一的移民集团,它在亚裔聚居区里腐烂化脓,威胁着来个大发作,用乙型肝炎让我们其余的人全部遭殃。

我提到的第二个需要,即在经济发展优先次序方面实现彻底的革命性变化以适应新的技术,现在甚至都很少提起。我在《澳大利亚人》里说过,如果没有根本的改变,澳大利亚在新的技术时代将无法维持其繁荣。当前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表明,我们的企业—政治—行政管理综合体对后工业社会的新发展趋势的反应比几乎所有其他类似国家的同行都迟钝。鲍勃·霍克^①在1990年竞选政纲演讲中提到的“明智的国家”本来可能是个良好的开端,可是一旦念完了那篇演讲稿,他就对这个词组(一位演讲稿撰写人为他加进去的)避之唯恐不及,人们再也听到过它了。

我们时时听到的“信息社会”这个词像一个有魔力的符咒,可是政治家们为之做了些什么呢?教育政策、科学政策、研究开发政策,所有这些在《澳大利亚人》里提出的规划,都变成了为压缩预算、增加利润服务的事情。它们本是必不可少的投资项目,但管账的人对这种想法不感兴趣。现在不断有人提倡使教育向“职业化”靠拢的急救办法,不过这也没有抓住要害。在新的不断变化的社会里,最有实用价值的训练的基础是高质量的、培养学习的终身兴趣和能力的常规教育。在这一切的同时,几乎无

① 霍克(1929—),1983—1991年任工党领袖,1983—1991年任总理。——译者

法置信的是,我们最为强调的始终是把食物、纤维、矿产送到几个“亚洲虎”国家去,让它们得以开发更多的巧妙玩意儿。为什么这样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我的“幸运之邦”命题的核心部分,即我们的传统是那种殖民地的思想方式和以模仿为主的实业文化,尤其是在制造业和银行业方面;而这种传统使我们不能理解新观念是生产因素之一。在我们的殖民地时代,大家都认识到在农牧业和矿业方面的革新是必要的,因为作为一个殖民地,农牧业和矿业是我们的本行。但在制造业方面,一旦起了步,我们的目标只是通过建立一个受到严格保护的、差不多彻底依赖他人的创新的工业来取代进口。几乎没有一个澳大利亚人想到过或许我们也能出口工业制品,因为这不是殖民地的事。我们的银行系统的思想方式同样也是殖民地式的。所以,工业革命的两大引擎——制造业和银行业——并没有为澳大利亚积聚起动力。当然,现在情况有所改善,但跟其他国家的改进速度相比还差得远。自80年代初以来,随着以救世主自居的保罗·基廷以及一大套经济方面的新理论的出现^①,对经济“改革”的宣传铺天盖地、不绝于耳,然而,这一改革主要着眼于取消从前的一些管制和保护,并没有考虑为制造什么新东西而创造条件。它也许是必要的,或者说绝大部分是必要的。但光凭这种改革是不够的,因为它偏离了从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即我在《澳大利亚人》里所说的,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机智地抓住新型技术带来的机会,“国家会变得一蹶不振、落伍陈旧、不知所措、怨声载道”。

^① 基廷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实现了澳元的浮动,取消了对金融市场的政府管制。——译者